

诸葛亮经济思想探微

刘春香 涂白诚

诸葛亮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这几乎是家喻户晓、尽人皆知的史实。事实上,诸葛亮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事家,而且在经济建设方面也有卓越的建树。本文试就诸葛亮的经济思想作一初步探讨。

一、草庐献策 谋划大业

恩格斯说:“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,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‘暴力’取得胜利”^①。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政治上的分裂、统一、再分裂、再统一,是与经济上出现的衰落、繁荣、再衰落、再繁荣密切相关的。经济的发展与否,对政治上的统一与分裂,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如何使一度衰落的社会经济恢复并重新得到发展,是历朝统治者在新王朝建立后,为巩固自己的政权,所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,是关系到这个王朝能不能存在下去的根本问题。

东汉末年至三国时代,频繁战争、连绵的自然灾害,不仅带来了政局的动荡,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社会生产力,使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状态。从社会经济状态来考察,刘备和孙权联合起来能取得赤壁大战的胜利,从而导致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,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。诸葛亮未出茅庐时的《隆中对》,就是他研究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后,作出的与社会经济现状相适应的决策——三分天下,鼎足而立,向大一统过渡。经济建设的意义在“隆中对”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,刘备“三顾茅庐”,诸葛亮根据平时所掌握的大量资料,针对当时天下形势,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地理、人事诸方面,向刘备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。诸葛亮对刘备说:“自董卓已来,豪杰并起,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。曹操比于袁绍,则名微而众寡,然操遂能克绍、以弱为强者,非惟天时,抑亦人谋也。今操已拥百万之众,挟天子以令诸侯,此诚不可与争锋”^②。曹操当时已占有广大的北方,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中心,各方面均占优势,刘备是不能和曹操争夺北方的。而“孙权据有江东,已历三世,国险而民附,贤能为之用,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”^③。孙权也在江东地区站稳了脚跟,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中心,刘备也不能和孙权去争夺江东。刘备可以向荆、益二州发展势力,利用这二州特有的经济条件,去形成自己的政治经济中心,因为“荆州北据汉沔,利用尽南海,东连吴、会,西通巴、蜀,此用武之国,而其主不能守。”“益州险塞,沃野千里,天府之土,高祖因之以成帝业,刘璋国弱,张鲁在北,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,智能之士思得明君”^④。如果刘备能占据荆益二州,就可以“外结孙权,内修政理,”一方面与孙权结成统一战线来共同对抗曹操,力争形成南北对峙局面,一方面对内修明政治,发展经济,把荆、益二州建成巩固的根据地,一旦“天下有变”,便能够据而统一天下。在这篇著名的“隆中对”中,诸葛亮用了“民殷国富”、“内修政理”一类表达经济思想的语言,而且从更高的角度、把经济作为占据荆益二州的重要条件来提出,这是诸葛亮充分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后得出的结论。当时,经过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、董卓之乱后,北方经济惨遭破坏,后来经过曹操屯田,北方经济有所恢复,但还远不足以统一全国,与此同时,南方经济则处于稳定之中并有所发展,形成了区域性的经济中心——荆益和江东。因此,北方、荆益、江东三个经济中心就成为三个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,再加上三个地区的势力集团作为三个政权各自的政治统治基础,使得三个政治集团在一个时期里保持着势均力敌的局势,任何一方都无力在短期内统一全国。随着魏、蜀、吴政权的相继出现,天下形势也趋于相对稳定,三国统治集团都意识到了军事对峙的长期性,因此纷纷将注意力集中于国内政治经济事务。为安定社会秩序、恢复发展社会经济,作

出了各自的努力。作为刘备重要谋士的诸葛亮，在赤壁大战后就十分重视经济的发展，蜀汉建国后，身任丞相主持国政，他又把“隆中对”中所确定的治国方针付诸实践，并取得了成效。

二、“为政以民为本”——“务农殖谷、闭关息民”

农业是古代社会具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。只有农业生产发达、封建经济基础巩固、封建国家经济实力雄厚，才能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以及进行统一战争。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，依据益州地区特点，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措施，使一个原本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社会经济能持续而稳定地向前发展、呈现繁荣局面，并且始终没出现过经济衰退、阶级矛盾尖锐化的现象，支持着仅占一州之地的蜀汉与强大的曹魏、孙吴鼎足而立几十年，这都表现了诸葛亮卓越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治理能力。

（一）“务农殖谷，闭关息民”

占有益州后，诸葛亮及其部下即已认识到：“为政以安民为本”，而安民就必须使人民足衣足食。因此，在他全权辅政以后，就大力恢复发展生产，实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“务农殖谷、闭关息民”政策^①；以适应北伐战争的需要，实现他统一全国的政治理想。诸葛亮说：治国就要“务立其本”“农耕”、“山林”、“川泽”都是所务之本，如若“地失其常，则有枯败”^②，他把农业生产的发展与否则政权的兴衰更替联系起来看，这是很有见地的。诸葛亮入蜀的时候，益州是一片生产停滞、国贫民疲的局面。自东汉后期以来，益州地区的统治者、特别是刘焉、刘璋父子，“贪残放滥，取受狼藉”，“赋敛烦扰”^③，逼使大批农民破产流亡，田地荒芜，生产衰败。针对这种现状，诸葛亮提出了“务农殖谷，闭关息民”的方针，以“闭境劝农，育养民物”^④，“劝农务穡，以阜民财”^⑤为指导思想，积极恢复和发展蜀汉的农业生产。诸葛亮继承了先秦法家“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”的进步思想，非常重视奖励耕战。他平生素志是为刘备父子重建刘汉政权，进而统一中国，其任务十分艰巨，因此他一生所筹划经营的也以务农运粮和练兵作战为主。不通过战争就不可能实现他的宿愿，而不重视农业生产就不能支持他的以弱攻强的战争，耕与战是不能分离的。粮食是军队的命脉，即使有高城深池、带甲百万，没有粮食也无法打胜仗。因此，他主张“唯劝农业，无夺其时”，即要鼓励老百姓好好从事农业生产，统治者不要妨碍老百姓及时进行耕种收割。刘备在世时，常外出征战，诸葛亮镇守成都，代行政事，就已做到了军粮有余，兵员不缺。刘备死后，诸葛亮辅佐后主，独立施政，为了恢复伐吴失败后的蜀国经济，把益州地区建设成进行统一战争的巩固的战略根据地，他积极奖励务农殖谷，实行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。诸葛亮连续进行了六次北伐，每次出征前都先致力于务农殖谷，令军民衣食足而后用之。

诸葛亮还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，改进农具，努力增加粮食产量，又专门挑选有理财经验的人，在政府机构中担任督农督粮官吏，加强粮食管理和对农业生产的督导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蜀汉农业生产的发展。

（二）高度重视水利建设

自有农业以来，水利建设就是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。为保障农业丰收，诸葛亮高度重视水利建设，把兴修水利上升到农之本、国之所资的重要地位来认识。战国时期修筑的都江堰，是蜀汉境内规模大，效益好的水利灌溉工程，它“灌溉三郡”，“旱则借以为溉，雨则不遏其流”^⑥，是成都平原农业丰收最重要的保障。诸葛亮在着重处理“务农殖谷”、“育养民物”诸事中，首先是维修与保护都江堰水利工程。《水经注》卷33《江水注》说：“诸葛亮北征，以此堰农本，国之所资，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，有堰官”，足见诸葛亮对都江堰的重视。诸葛亮还在成都修筑了九里堤，以防止洪水对成都西北隅一带田园的危害。由于农田能得到灌溉，水旱从人，成都平原上“沟洫脉散，疆理绮错，黍稷油油，粳稻莫莫”^⑦，出现了一派沟渠纵横、稻浪滚滚的如画景象。

诸葛亮兴修水利，着力在汉中地区，汉中盆地西起今陕西勉县，东至洋县，东西长百公里，南北宽十至三十公里，汉水自西而东贯穿其中，其众多的支流给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有利条件。建安二十年（215年），曹操攻降张鲁，之后多次将汉中之民北徙，使汉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大为减少。建安二十四年（219），刘备夺得汉中，诸葛亮为了便利北伐，而开始在汉中实行军士屯田。建兴五年（227年），诸葛亮上表北伐，移驻汉中，亲手抓了军士屯田和兴修水利之事。据《清一统志》记载：萧何曾在今汉中市北修筑了山河堰，以截流褒水，灌溉农田；诸葛亮劝农于黄沙时，又对山河堰进行“踵迹增筑”。汉中盆地内

各县县志中都有关于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记载。近年考古发掘出的古堰渠、陂池遗址和陶制陂池、陶稻田等文物也证实：蜀汉时期汉中水利事业是相当发达的^⑨。特别是临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遗址，更可推断与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关。

（三）以农业为本 治理南中

蜀汉的南部，即所谓“南中”。东汉时在南中设置有益州郡（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）、永昌郡（治今云南保山市）、牂柯郡（治今贵州福泉县西）、越巂郡（治今四川西昌市东南）四个郡及犍为属国。蜀汉建兴三年（225年）诸葛亮平定南中后，重新划分为七个郡：越巂郡（治邛都，今四川西昌市）、朱提郡（治朱提，今云南昭通市）、牂柯郡（治且兰，今贵州福泉县人建宁郡（治味县，今云南曲靖市）、兴古郡（治宛温，今云南砚山北）、永昌郡（治不韦，今云南保山）、云南郡（治桥栋，今云南姚安北）。蜀在三国中最为弱小，和诸葛亮正要讨伐的曹魏相比，仅有一州之地。蜀汉的一州之地中，南中就占去了一半。在这小小的半壁疆土中，却有着丰富的金、银、丹、漆、耕牛、战马等物产，还有性情质朴又强悍善战的各族人民，这些都是增加蜀汉人力物力的重要因素。诸葛亮在南中采取“和”、“抚”为主的民族政策，通过南中上层分子的支持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条件，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来大力发展南中的经济，这些政策和措施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。

诸葛亮治理南中以前，南中多数地区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制早期，经济文化原始荒蛮。诸葛亮在南中大力贯彻“以农为本”的方针，重点发展农业生产，把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方法传到南中，派专人教南中人民牛耕，以取代原始的刀耕火种，促使西南少数民族快速的进步。发展农业生产的结果，使部分世居深山、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人民“渐去山林，徙居平地，建城邑，务农桑^⑩”，不仅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进步，而且增加了农业生产人手。在发展南中农业生产的同时，诸葛亮还很重视兴修水利设施，曾在永昌郡周围修建了灌田数千亩的诸葛堰三口。农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迅速发展。诸葛亮在南中也采取了盐铁官营措施，征收奴隶主的矿山盐井为官有，设置盐铁官专司采矿、煮盐事宜，又派人去南中教授织锦之法。当时永昌郡参照蜀锦织法织出的檀华布，竟然畅销于号称织锦之冠的成都。特别是牂牛道打通、沿途驿亭修复后，南中与蜀中的经济文化交流更方便更频繁，蜀郡、永昌成为蜀汉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。号称“不毛之地”的南中也出现了不少繁华的集镇。治理南中的结果，是为蜀汉连续八年的北伐战争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军备物资。如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载：“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，为五部，所当无前，号为飞军”。《诸葛亮传》说：“军资所出，国以富饶”。《三国志》卷43《李恢传》载：“南土平定……赋出叟，濮耕牛、战马、金、银、犀革，充继军资，于是费用不乏。”（叟族为西羌的一个支族，主要分布于南中的越巂、建宁、朱提等郡；濮族为西南古老民族，武王伐纣所率八族中就有濮，后因散居而互不统属，号称百濮，主要居于滇池周围及南中各郡。——作者注）这些事实也表明南中的经济建设卓有成效。诸葛亮治理南中，单从经济上来认识，可以认为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对南中地区进行的经济开发。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南中地区闭塞落后的状况，促进了南中的社会进步，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努力，因此南中各族人民对诸葛亮“爱之如祖考”，以致于诸葛亮死后，“百姓巷祭，戎夷野祀”，悼念不已。

三、积极发展工商业——盐铁官营，蜀锦为主的经济思想

中国自战国以来，即已总结出了无农不稳、无工不富、无商不活这一封建经济规律。诸葛亮在重点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，同样重视手工业、商业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。

蜀地自古以来煮盐业、冶铁铸铜业都很发达。西汉时蜀地著名富室卓氏，其祖先是赵国人，战国末年作为秦虏被迫迁蜀，居临邛冶铁而成巨富；程郑也是战国末迁蜀的秦虏，与卓氏俱居临邛，同样依靠冶铸业致富，财产超过卓氏。这些都载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汉文帝曾把蜀之严道铜山优赐给上大夫邓通，邓通“以铸钱财过王者”，成为富翁。汉武帝时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实行了盐铁官营，东汉时“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^⑪”。此后，政府专卖的禁榷制度瓦解，大豪强地主大工商业者控制了盐铁生产和经营，厚重的利润落入豪民之手，从而阻碍了盐铁业的生产和发展。

盐铁业事关国计民生。诸葛亮对此十分重视。为了抑制豪强地主的“专权自恣”，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，在蜀汉境内重新恢复了盐铁官营制度，设置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，专门管理盐铁生产销售，发展盐铁事业。

《三国志》卷41《王连传》及卷43《张裔传》等资料记载；蜀汉以王连“迁司盐校尉，较盐铁之利，利入甚多，有裨国用”；又以张裔“为司金中郎将，典作农战之器。”二人因领导盐铁生产成效显著，后来都升为丞相长史，这充分说明诸葛亮对盐铁业的重视。在这种情形下，蜀汉的盐铁业发展很快；《山川记异》载：蜀国“诸葛盐井有十四”⁴⁹；左思在《蜀都赋》中称赞蜀汉“家有盐泉之井”；“火井沈荧于幽泉，离焰飞煽于天垂”。当时蜀国到处开矿炼铁，凿井煮盐，相传诸葛亮曾多次到临邛视察火井（火井即天然气），还说井火因诸葛亮“一窥而更盛”⁵⁰。盐铁业的发展，使国家从盐铁业上获利甚多，对国家财政有很大的补益。盐铁官营也从经济上限制和打击了豪强势力，从而巩固了蜀汉政权。

植桑养蚕是我国的古老传统。诸葛亮对植桑养蚕及纺织业的发展是与耕地种谷同样看待的。蜀锦为当地的特产，但汉末以来由于军阀割据而没能得到发展。诸葛亮说：“今民贫国虚，决敌之资，唯仰锦耳”，把蜀锦的生产提高到支持统一战争的重要地位。诸葛亮深知，与强大的魏国为敌，光靠增产粮食和向农民征收赋税是不行的，过分征税会失去民心，粮食也难以久存和远运。所以为蜀汉开辟财源的捷径是用名贵的蜀锦去赚取巨额利润，从而支持庞大的军费开支。因此他大力提倡植桑养蚕，开辟财源，并身体力行，在成都郊外双流县东北八里他的家中种桑八百株。在诸葛亮的大力倡导下，蜀汉的织锦业盛极一时，川西平原上“阡陌之里，伎巧之家，百室离房，机杼相和。贝锦斐成，濯色江波，黄润比筒，纂金所过”⁵¹蜀锦大量生产出来，畅销于西南，并大量销往吴、魏。《丹阳记》说：“江东历代尚未有锦，而成都独称妙。”《太平御览》卷185布帛条说：“三国时，魏则市于蜀，而吴亦资西道。”诸葛亮把蜀锦生产放在发展手工业的首要位置，使蜀锦成为蜀汉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，无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，巩固了蜀汉的统治。

四、旨在减轻人民负担的轻徭薄赋思想

诸葛亮的理想社会是“粮饷丰，财货多，百姓安”⁵²。他说：“圣人之治理也，安其居，乐其业”⁵³，“上下和睦，百姓安乐”⁵⁴。要想达到“国富民安”的政治目的，就不能“克食于民”，否则“人有饥乏之变，则生乱逆”⁵⁵。而使国富民安的唯一办法是：“唯劝农业，无夺其时；唯薄赋敛，无尽民财”⁵⁶，一方面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，反对以政令妨害农事，一方面适当约束豪强地主，不使他们过分压榨小农，以免造成“强弱相侵，躬耕者少”，“民如浮云，手足不安”⁵⁷的局面。总之，只有“使民心不乱”⁵⁸，经济才能得到发展，并使政局稳定，为此，诸葛亮把成都附近一些荒芜土地归还给因战乱和灾荒而逃亡的农民，“令安居复业”⁵⁹。又“铸直平钱，平诸物价，令吏为官市”⁶⁰，以防止商人对百姓的过分剥削。为了减少军费支出，诸葛亮组织军士屯田，以解决北伐军粮问题。由于蜀中荒地很少，屯田条件远不如魏吴，而且如果从蜀往北伐前线的汉中运送军粮，需翻高山，越峻岭，远远不如在汉中就地屯田，因此诸葛亮把屯田的重点放在了汉中。汉中土地肥沃，气候温暖，雨量充沛，物产丰饶，自然条件较为优越；刘备夺得汉中时，汉中人户已被曹操及其将领迁走很多，故史称刘备得汉中，只“得地而不得民”⁶¹。这样，汉中屯田的先决条件已具备，诸葛亮便从蜀中等地募集了五千兵士去汉中屯田。建兴五年（225年），诸葛亮率军出屯汉中，从此直至他去世，六七年中，他一方面连续发动北伐战争，一方面为北伐而主持屯田、练兵、修桥、筑路、制造运输工具木牛、流马。《三国志》卷33《后主传》载：建兴十年（232年），“亮休士劝农于黄沙，作流马木牛毕，教兵讲武。”黄沙在今陕西勉县东、褒城南，当褒水流入汉水处。诸葛亮既在黄沙休士劝农，黄沙当为诸葛亮来自主持的军屯地之一。《诸葛亮传》记载：诸葛亮和司马懿对峙于渭南时，“亮每患粮不继，使己志不申，是以分兵屯田，为久驻之基。”在率军深入敌境、与强敌激烈对峙搏斗之际，仍然发兵屯田，以支持长期战争，说明诸葛亮对屯田十分重视。另外，诸葛亮还实行“精兵”政策，始终把兵员控制在一定数额内，以免把青壮年劳动力抽光，影响农业生产。对于在前线作战的将士，也实行定期退伍制度，到期即更换，决不拖延。这一措施，不但减少了军费开支，而且保证了有充足的青壮年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，即使在战争频繁的年代，也维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。总之，诸葛亮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和措施，对安定人民生活、缓和阶级矛盾，起了积极的作用。

五、提倡节流积蓄 反对奢侈浪费

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，奢或俭不单纯是一个道德问题，更是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，古代一些著名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人都大力提倡“宁俭”、“节用”。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也十分注重这个问题。他在重点奖励农耕，极力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，主张节约费用，减少财政开支，以支持统一战争。东汉以来，豪强地主

田庄经济大发展，他们“连栋数百，豪田满野，奴婢千群，徒附万计。船车贾贩，周于四方；废居积贮，满于都城。琦赂宝货，巨室不能容；马牛羊豕，山谷不能受。妖童美妾，填乎绮室；昌讴伎乐，列乎深堂……三牲之内，臭而不能受；清醇之酎，败而不可饮^①”，生活极端腐化，败坏了社会风气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惊人浪费。诸葛亮力主革除这种陋习，提倡清约俭朴。他认为：“作无用之器，聚无益之货。金银璧玉，珠玕翡翠，奇珍异宝，远方所出，此非庶人之所用也；锦绣纂组，绮罗绶毂，玄黄衣帛，此非庶人之所服也；雕文刻镂，伎作之巧，难成之功，妨害农事，辘辘出入，袍裘索襚，此非庶人之所饰也；重门画兽，萧墙数仞，冢墓过濶，竭财高尚，此非庶人之所居也^②”，他要求蜀汉各级官吏“清心寡欲，约己爱民^③”。他主张“躬耕勤苦，谨身节用”，“丰年不奢，凶年不俭，素有蓄积，以储其后^④”。为了厉行节俭，矫治社会风气，身为丞相的诸葛亮带头清廉，不增私产。他在成都的家仅有“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”，和当时广有田产的豪姓大族根本无法相比。他给后主刘禅上表说：“至于臣在外任，无别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”到诸葛亮死时，家内外任果然没有多余的财产^⑤，《北堂书钞》卷三九也说他“蓄无余财，妾无副服。”这种廉洁的作风，堪称蜀汉官吏的表率。

汉以来，“礼”制盛行，“天下送死者靡，多作石室、石兽、碑铭等物^⑥”，婚丧嫁娶摆排场讲阔气，厚葬重殓成风。那些达官贵人、豪富之家不惜重资殡葬死者自不待言，甚至家中稍有资产的，也倾尽全力来举办丧事。史载刘璋据蜀时，“时俗奢多。货殖之家，侯服玉食，婚姻葬送，倾家竭产^⑦”。诸葛亮坚决反叛这种奢侈腐败之风，主张殡仪从简，并在这一点上同样身体力行。诸葛亮病逝于武功五丈原军中，临终“遗命葬汉中定军山。因山为坟，冢足容棺，敛以时服，不须器物^⑧”。堂堂蜀汉丞相，死后仅只用现成衣服装殓，连新衣都不做一件，所挖墓穴，也只够放下一具棺材，而不起造墓室，不放置任何陪葬器物，确实是以自己的高风亮节来开社会风气之光的

正由于诸葛亮不仅用言教，而且用身教来反对奢侈浮华、铺张浪费的庸俗作风，从而在蜀汉范围内抑制了自汉末以来官贪吏残、搜刮无度的弊端，出现了较为清明的吏治。陈寿在《诸葛亮传》中反复称颂诸葛亮的德政：“吏不容奸，人怀自厉，道不拾遗，强不侵弱，风化肃然”等等，表明诸葛亮的治理确实是成功的。蜀汉统治集团的上层一般都能廉洁自律，不贪婪不兼并，大小官员也都能“清素节约^⑨”。如大将军费祎，“家不积财，儿子皆布衣素食，出入不从车骑，无异凡人^⑩”；大将军姜维“宅舍弊薄，资财无余^⑪”；曾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、大司马府事的董和，“死之日，家无儋石之财^⑫”；尚书令刘巴“躬履清俭，不治产业^⑬”；车骑将军邓芝“终不治产业，妻子不免饥寒，死之日，家无余财^⑭”；尚书令吕 X (αi, 音艾)“治身俭约”等等。正由于蜀汉统治集团整体作风比较清廉，才促成了整个蜀汉社会风气的好转，并支持着这个僻居一隅的政权与强魏强吴鼎立几十年。

总之，蜀汉在诸葛亮的治理下，出现了“田畴辟，仓廩实，器械利、蓄积饶，朝会不华，路无醉人^⑮”的清平景象。虽然诸葛亮经济思想及其政策，不能超越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的范围，也不允许违反蜀汉最高统治集团的根本利益，但是，如果从《华阳国志》中所记载的“益州西部金银宝货之地，居其官者，皆富及十世”的情况来看，在豪强地主百般欺凌盘剥农民、为官吏者贪得无厌的时候，诸葛亮能力矫种种弊端，抑制土地兼并，致力发展生产，对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积极意义，客观上起到了积极促进经济发展，稳定政治局势、安定人民生活的作用。诸葛亮死后，蜀汉的人民对他的思念，几十年不曾稍减。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、晋代人袁准都说蜀人思念诸葛亮，犹如西周人民思念周公、召公，可见诸葛亮确实受到了人民的歌颂和怀念。如果不是诸葛亮的各项政策符合人们的某些愿望和利益，如果不是他个人的高尚品质受到了人们的敬仰，人们又怎么会如此怀念他？诸葛亮不失为封建时代杰出的经济政治家。

注 释

- ①恩格斯《反杜林论》，《马恩选集》卷三第211页。
- ②、③、④、⑫、⑮《三国志》卷三五《诸葛亮传》。
- ⑤《三国志》卷33《后主传》。

- ⑥ 《诸葛亮集》卷三《便宜十六策·治国》。
- ⑦ 《三国志》卷三一《刘二牧传》。
- ⑧ 《三国志》卷四二《杜微传》。
- ⑨ 《诸葛亮集·为后帝伐魏诏》。
- ⑩ 《水经注》卷33《江水注》。
- ⑪、⑰左思《蜀都赋》。
- ⑫参看：唐金裕《从水文考古调查看古代汉中地区的灌溉设施》，载于《文博》1984年2期；郭清华《陕西勉县老道寺四号汉墓发掘简报》，载于《考古与文物》1982年2期。
- ⑬杨慎《滇载记》。
- ⑭《后汉书》卷四《和帝纪》。
- ⑮《诸葛亮集》卷五《遗迹篇》。
- ⑯《初学记》卷731《异苑》。
- ⑰《诸葛亮集》卷四《揣能》。
- ⑱《诸葛亮集》卷四《不陈》。
- ⑳《诸葛亮集》卷四《东夷》。
- ㉑、㉒、㉓、㉔、㉕、㉖《诸葛亮集》卷三《便宜十六策·治人》。
- ㉗《三国志》卷三六《赵云传》注引《云别传》。
- ㉘《三国志》卷三九《刘巴传》注引《零陵先贤传》。
- ㉙《三国志》卷四二《周群传》。
- ㉚《后汉书》卷四九《仲长统传》。
- ㉛《全三国文》卷五八。
- ㉜《宋书》卷十五《礼志》。
- ㉝《三国志》卷三九《董和传》。
- ㉞⑰⑱《三国志》卷四《费祎姜维传》。
- ㉟⑳《三国志》卷三九《董和刘巴传》。
- ㊱《三国志》卷四五《邓芝传》。